

為後世塑造公眾 形象：蔣中正 「事略稿本」之 編纂

黃倩茹 著 美國紐約聖羅倫斯大學
(St. Lawrence University) 助理教授
廖文碩 譯 國史館助修

原刊於 Grace C. Huang, "Creating a public face for posterity: The making of Chiang Kai-shek's Shilüe manuscripts," *Modern China*, 36:6 (November 2010), pp. 617-643. Copyright © (2011) by SAGE Publications, Inc.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SAGE Publications, Inc. 譯文與原文寫作格式同。

摘要

戰火之中，秘書們開始選錄蔣中正的日記、電文、報告、講詞等，編纂「事略稿本」（大約意指「草稿」或「工作手稿」）。由於國民黨撤退臺灣，稿本並不完整，且各部分完成度不同，後人卻得以窺見中國領導人政治正當性的建立過程。本文將「事略」與最近似的歷代正史相較，發現其內容反映了由古代君民到現代國家領袖與公民之間的關係變化。此外，藉由釐清「事略」作為政治或歷史文件的編修方法，本文指出不同秘書主稿「事略」的目標與能力有別，影響後世對蔣歷史遺緒的看法。

關鍵字：蔣中正（介石），中國史學，政治領導，政治正當性，民國時期

逐段、逐頁、逐冊，秘書以毛筆忠實寫下蔣中正的言行。蔣的所有發言似乎都能成為檔案，而他常滔滔不絕，他習於做三個小時以上的演說，持續寫了六十年的日記。蔣中正的秘書們以此類資料為基礎，編纂如「困勉記」、「游記」、「學記」、「省克記」、「愛記」、「復興贅筆」等年代記，其中以「蔣公事略稿本」最為詳盡，秘書們大量引用蔣的日記、重要電文、記者訪談、講詞、報告、會議或演講感想。「事略稿本」總計逾三百冊，起迄時間自 1927 年至 1949

年。

「事略稿本」值得重視，理由如下：首先，「事略」的體制背景有助理解蔣中正的權力之路。抗戰期間，塑造蔣中正政治影響力的工作，令人難以相信地交給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的侍從室。這其實是蔣的設計：舉剿共「匪」之大旗，遠離中央黨部與政府層峰，拓展他在內政事務的權力。

其次，「事略」反映出民族主義與近代化發展重新界定了領袖與人民的關係。白話運動是促成變遷的關鍵因素之一，中國話的口語化使更多的老百姓得以接觸原本由精英獨享的視野。「事略」不僅多少帶點白話，與歷代正史裡的帝王相較，「事略」所呈現的蔣中正性格也較為鮮明。「事略」因此標誌了中國領導人的相關史料在內容與風格上的變遷，呈現由古代君民到現代國家領袖與公民之間的關係變化。

再者，「事略」讓人看到了建立蔣中正後世政治正當性的幕後努力。「事略」的文體使編纂者有極大彈性去選擇與組織資料。此外，由於稿本始終未完成且各部分完成度相異，許多較具爭議或使人受辱的訊息便不對外公開。三位主稿秘書各自負責不同年份的「事略」而使差異互見。檢視「事略」作為政治或歷史文件的編修方法與原則，顯示主稿者能力與編纂目標各異，對於修史與美化領袖形象的政治意圖如何權衡，取捨亦不相同。

本文有二發現：其一，「事略稿本」的

編纂與中國政治領導風格的重要變遷若合符節。蔣中正明白並反映了新興的大眾政治。不論是事實或是他與幕僚的看法，政治正當性的基礎一反既往，端賴現代化、民族主義及愛國主義。「事略」的內容體現了這樣的改變，例如「事略」收錄蔣中正對中國青年的講詞，對照以往的正史則盡是較為抽象的令告與官方紀錄。

其二，戰亂期間蔣中正仍留意修史，不論戰爭結果如何，堅決要為後世塑造其政治正當性。然而蔣畢竟無法任意操控他身後的影響力。秘書們編纂「事略」的各自目標與能力，左右了蔣中正公眾形象的敘述與可信度，也因此明顯地提升或減損了他個人的努力。藉由探索蔣當權時本身的形象塑造與秘書重塑工作之間的相互作用，本文嘗試對以修史塑造政治正當性的過程與如何評價這類史料，有更寬廣的認識。

蔣中正《事略稿本》的背景

1940年起，侍從室秘書開始進行稿本的編纂工作。在1930至1940年代，侍從室對蔣中正政權舉足輕重。1932年蔣中正復權後，隨即重建並親自領導軍事委員會，隔年夏天於委員會下成立剿匪總司令部、行營及侍從室。重要的是，蔣中正將這三個機構分別設置於南昌、漢口、重慶、西安等處，遠離南京中央政府與黨部（So, 2002:218），並幫助他控制這些地區，儘管

行政院長汪精衛在形式上擁有行政管轄權。

侍從室是權力核心所在。根據當時供職的何廉表示，侍從室有效地將行政院排除在核心之外（So, 2002:218-19）。根據 1935 年至 1947 年間跟隨蔣中正的居亦僑觀察，侍從室如同皇帝印璽，核准所有重要人事任命與軍事行動。居亦僑（1988:16）進一步指出，蔣中正強調個人聯繫與地緣關係，以確保人員忠誠。侍從人員不是他浙北奉化同鄉，就是黃埔軍校出身。

抗戰初期，蔣中正將侍從室遷往抗戰之都重慶，並擴編增設三處與侍衛長。第一處處理軍事業務，第二處政治業務，第三處安全事務〔譯註：應為人事業務〕，侍衛長則負責蔣中正人身安全（張令澳，1995:13-14）。

侍從室第二處第五組（簡稱侍五組）與本文特別相關。侍五組秘書們早先都是蔣中正的耳目，分別精通英、法、德、日、俄等外語。侍從人員張令澳指出，1940 年侍五組業務改為「專事整理、編纂和保管蔣中正自北伐以來的言論、文告、信札、日記、實錄等工作」（張令澳，18），暗示幕僚此時已經開始編纂「事略稿本」。即使是戰爭期間，侍五組又設於軍事機關之下，蔣中正展開編修他個人領導史的工作，無論戰爭結果如何，他也不忘確立身後的政治影響力。

陶希聖早年曾為蔣中正《中國之命運》一書撰稿（張令澳 1995:18），1938 年繼陳布雷之後主管侍五組，陳則升任第二處處長，是侍五組的頂頭上司。自 1925 年起迄

蔣中正逝世為止，前後共計四人負責保管蔣中正的個人文卷，依序為毛思誠（1925-1934）、陳布雷（1934-1946）、周宏濤（1946-1958）、秦孝儀（1958-1975）（張炎憲，2003:i-ii）。

目前並不清楚究竟陳布雷與陶希聖如何督導「事略」的編纂工作。稿本的前後變化明顯可見，但都是秘書們手改的。此外，這些稿本看似初稿，特別是 1927 年至 1933 年的部分，似乎是主稿者個人所為。幾十年後，稿本已運往臺灣，秦孝儀又加註評語，有時直接寫在稿本上，有時則以小紙條附上。這些評語與當年主稿的風格相異，可以輕易識別（參見孫詒，1927 年 9 月 2 日）。

雖然有專人支援蒐集資料，三位主稿秘書主要負責 1927 至 1934 年「事略」的文稿節抄工作。首先，由「事略稿本」的實際狀況可見端倪。稿本各冊以細白線裝訂，主稿秘書於封面簽名，並親筆以楷書繕寫全冊。以時間為經分年編撰，再按月分冊（有時為半月或雙月）。三位主稿者包括：孫詒負責 1927、1930、1933 年；王宇高負責 1928、1931、1932 年；袁惠常負責 1929、1934 年。其次，三人「語調」各異，例如袁惠常語帶恭敬、孫詒明顯草率，各人分別負責的年份所呈現風格是一致的。

三位主稿秘書中，僅王宇高（1897-1984）的生平較為人所知。他曾教授中醫學、主編中醫雜誌，卻偏離本業，擔任蔣中正的侍從達十年之久。某些一般因素使王宇

高能雀屏中選去編纂「事略」、「愛記」及「學記」。首先，王宇高是蔣的奉化同鄉，當年籍貫對於終生關係的建立十分重要；其次，1937年抗戰爆發中斷了他在浙江的工作，因而加入其他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員的行列，移居重慶。再者，他精通中醫學，嫻熟古文，這些都有助於彙整蔣中正的檔案資料。王宇高在侍從工作上必定相當成功，1945年蔣中正領導抗戰勝利後，他升任文官處編審與國史館協修，被賦予更大的責任。然而國共內戰國民黨失敗後，王宇高回到浙江寧波重操舊業，並未跟隨蔣中正到臺灣（奉化市農業信息網，日期不詳）。

正如產生「事略」的體制背景有助於了解蔣中正的領袖之路，體制的中斷影響了「事略」的保存工作，也反映了國民黨歷史及其轉型。主要間斷來自於國民黨撤退到臺灣，主稿秘書無法繼續改稿。如上所述，王宇高並未來臺。然而，隨蔣中正來臺的秘書秦孝儀努力延續「事略」的原始目標，他積極研讀稿本，在適當處加以修正，並據此最終於1978年完成了八冊《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讀來有如官方版本的傳記。

國民黨撤臺使「事略」的編纂中斷且失去整體性，而臺灣的民主化則可被視為體制再次間斷的原因。基本上，蔣中正檔案的典藏機構國史館的「國家」認同，一度由傾向國民黨（「國民黨終將光復大陸」）轉而強調臺灣人意識（「臺灣獨立於中國之外」），也折損蔣中正檔案編纂的有關記憶。

臺灣的民主化尚且造成了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體制間斷，扭轉了「事略」的原始目的。不再只是流通於少數黨員間的內部文件，「事略」如今改而向全世界開放。國史館自2003年開始出版「事略稿本」，前館長張炎憲（任期2000-2008）在序言中提到，「事略」有助於釐清蔣中正的政策與史事發生順序，並呈現了他的「真正想法」與「內心世界」。雖然蔣中正想法的「真實性」有待下文討論，這個看法卻指出了「事略」有別於國民黨文宣塑造的蔣中正故事。由於「事略」照章記載蔣的言行，例如直接收錄他的某個電文，而非轉述其內容，因此與第三人稱的大事紀要、傳記或自傳相較，操弄文字以達成宣傳或創作目的的空間較小。

體制間斷對於我們理解「事略」而言，好壞參半。一方面，國民黨撤退臺灣、其後臺灣史成為顯學、加上資料文件的幾次搬遷等，對於「事略」作為歷史文件，有關編纂目標與方法的整體記憶因而中斷。另一方面，民主化終於使這些曾經是機密的文件對外公開。下節將探討「事略」因體制中斷所產生的鴻溝與機會。

「事略」與中國傳統史學

蔣中正的「事略」與中國正史史學與文體密切相關，正史記述各朝代帝王政績，並強調公共道德與政權正當性。因此，正史與「事略」所設定的讀者群相似，包括未來的

政治領袖與史家，但「事略」的讀者較廣，也包含一般民眾。將「事略」置於中國傳統史學的脈絡思考，我們可以更清楚地剖析「事略」與其前身的異同。

《春秋》（西元前 722-481 年）深刻影響其後的史學著述，給予「史家應堅持政治道德此一概念的首次權威性表示」（Gardner, 1970:13）。因此，儘管史官以客觀呈現史實為宗旨，隱惡揚善也是重要目標（Vogelsang, 2005:150）。「事略」仿照《春秋》編年體例，更效法其教化寓意。

如同傳統史官，「事略」主稿者經由編訂史料，提高歷史教化功能。然而，蔣中正個人貢獻更大，他的文稿充滿了儒家道德教訓（參見袁惠常，1934 年 3 月 20 日；《蔣中正日記（以下簡稱蔣）》2006:25/237-318），並舉歷史人物為楷模，以沉潛二十年終於滅吳的勾踐、宋代英雄岳飛（袁惠常，1934 年 2 月 11、17 日；蔣中正 2006:24/387, 440-41）及耶穌（袁惠常，1934 年 5 月 4 日；《蔣》2006:26/24）等為例，鞭策自我與部屬實現統一中國、擊退日軍。受王陽明所倡新儒家的致良知學說啟發，蔣的教化思想也期許自我能改過向善（參見王宇高，1928 年 6 月 15 日項；《蔣》2003:3/520）。因此，秘書們所編抄的資料已蘊含教化意旨。

「事略」打算教化何人呢？可能是未來的中國領導人，尤其在面臨內憂外患之時。正如蔣以先賢為師，未來的領袖則可以他為

依歸，效法他「忍恥」以領導國家克服困境。

除了教化目的，「事略」與官修正史同樣以建立政權的正當性為目標。自唐迄清，對於以武力征服或叛亂取得政權的朝代而言，編修正史一事特別重要。延續傳統編修前朝正史能夠證明本朝的「正統」，並藉由招募前朝文人與忠臣修史，進一步加強其正當性（楊聯陞，1965:47-48）。

依此類推，後世政權應能取材「事略」來編修正史，以鞏固蔣與這些政權的正當性。有趣的是，過去二十年間，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也以相同策略，重提抗戰為中國大陸與臺灣尋求共識的契機，並再次評價蔣中正：他不再被視為「資本主義的反動工具」，而是「曾犯了嚴重錯誤，但抗戰期間扮演重要的愛國角色、所領導的政府對中國近代化卓有貢獻者」（Mitter, 2004:298）。

未來的專業史家或黨史專家也可能對「事略」感興趣。前者可藉此衡量蔣中正政權的正當性，後者則能據此撰寫官方歷史，好比秦孝儀的著作，以加強國民黨的政治正當性與影響力。這二類史家都能影響當代或後世對於蔣及其領導風格的理解與詮釋。

「事略」與正史仍存在重大差異。日記皆為二者的主要素材，但日記的產生方式卻截然不同。古代「起居注」史官記錄的是「皇帝所有公開言行及其參與治理和其他事務的細節」（Gardner, 1970:88）。皇帝被禁止閱讀本朝紀錄，以保障史官的獨立性

（楊聯陞，1965:50），並「透過詳盡、中立的記載所知之事，防止皇帝失職或觸法」（Franke, 1965:61）。

皇帝駕崩後，使臣集合而編寫「實錄」，主要即根據起居注，並補充皇帝在位期間的其他相關材料（Franke, 1965:61）。官修正史網羅「實錄」等史料，內容涵蓋歷代帝王傳記、典章制度、皇室系譜年表、名人列傳等（Gardner, 1970:87-88）。

與帝王的「起居注」不同，蔣中正自己寫日記，他也積極參與編纂「事略」。這些都可能危害了正史所重視的客觀性。然而，下節在深入探討後發現，某些因素仍有助維持「事略」的可信度。至少，日記可與其他史料交參佐證，包括他會見何人、搭乘何種交通工具、所在何方。更重要的是，當蔣表達個人意見時，秘書會以原文引述。儘管不可能完全客觀，秘書將日記中主客觀內容加以區別，接近正史的客觀性。

另一方面，蔣中正個人的深刻印記使「事略」與中國史學傳統明顯斷裂，並反映新的世界秩序，領袖以民族主義訴諸大眾，也因此透露更多的個人性格。與正史中的公共形象不同，「事略」的公共形象與一般大眾相關。「事略」以民眾為目標讀者，不僅以建立蔣的政治影響力為目標，並以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灌輸後代，傳達國民黨執政時期中國的艱難處境。

「事略稿本」的意義及內涵

上文的討論可能使人以為「事略稿本」與正史同為成書，其實並非如此。以「事略稿本」為題的意義及內涵，是理解蔣中正後世形象塑造工程的基礎，值得深究。「事略」之名，與中國史書傳記體裁相類，但結構較為鬆散。「事」字意指「事件」或「事務」，「略」字意指「忽略」或「大約、簡略」的意思（《漢語大詞典》，1993），標明該體例的特殊性，表示其未完成，根據姚華的解釋，「（事略）或生平梗概，雖已悉書，然恐其不詳也，故亦稱略，以待增益。」（《漢語大詞典》，1993）。

事略的體例使選擇或架構史料的彈性大增。如姚華所言：「事略不必如行狀、行述〔註：二種提供立傳依據的文體〕之具備，即一言一事，亦可成篇。」（《漢語大詞典》，1993）。陸瑯所著《群忠事略》涵蓋明代君權鬥爭下所產生不名譽的靖難之變，這是由於事略體裁與逐年紀事的「年譜」或官員「傳記」有別，得以詳細記載此類關鍵事件。〔譯註：陸瑯《簞齋雜著》：「縉雲鄭禧宗慶，卒安慶。予以使至，索其書觀之，有所謂《群忠事略》者，蓋紀靖難時死事諸賢。」（《忠賢奇秘》，頁4）《群忠事略》係鄭禧所撰。〕事略題材包括言論與事件，也能擴及歷代史志。如南宋王偁所撰《東都事略》，記載北宋九朝事蹟（《漢語大詞典》，1993）。

雖然蔣中正的秘書以類似「年譜」的形

式逐日記事，「事略」的體例仍具特質。一方面，蔣的「事略」既有別於傳統正史手法，也與其當代的編年傳記如《陳布雷回憶錄》（1967年出版）不同。後二者記事平鋪直敘，排除個人著述或言論，也因此使讀者無法一窺傳主性格。另一方面，蔣中正的「事略」仍接近歷史寫作標準。除了節抄言論、函電及日記，主稿秘書以正史的客觀精神撰述事件始末，蔣中正的「事略」因之也與其侍從秘書張令澳個人的回憶錄（1995年）風格相左。如何打造這種介於兩者之間的手法，主稿秘書在「事略」的編纂上各有所表。這些差異稍後再行探討。

與事略的「略」字意義相近，「稿本」一詞還表示了另一層內涵。內部流通的這些稿本，是黨的秘書或史家編寫官方紀傳的材料。由於這些材料只對黨內公開，「事略」的主稿秘書因而較能自由地嘗試取用日後可能被摒棄的材料。

稿本展現了不同階段的完成度。初期（1927-1933）的「事略」較之後期（1934-1949）更類似草稿。這也許是由於擬稿的階段不同，抑或1934年以後資料彙整方法較有系統，或者兩者皆是。稿本因此以數個不同階段的完成程度公諸於世。

與上述完成度較高的秦孝儀的《總統蔣公大事長編》（1978年）相較，更加突顯「事略」保存稿本狀態的重要性。首先，秦孝儀只挑選重要日期編寫；再者，更重要的是，對蔣不利的細節都被刪除。所有中西史家都

避免不實敘述，但中國史家還可能被迫刪去令人蒙羞的訊息（Gardner, 1970:68）。

因為秘書們採用了一種靈活的中國史書體裁編寫「事略」，如今以稿本形式對外公開，我們得以觀察塑造蔣中正後世形象幕後的集體努力。

塑造公共形象

製作「事略稿本」的終極目標在為後世塑造有關領袖蔣中正的故事，情節則應首尾連貫且令人信服。為了實踐目標，主稿秘書必須考慮所收錄言行與事件對歷史或對蔣中正個人生命有相當的重要性，並且為通篇「事略」選擇統一的「語氣」（劉維開，2003）。本節首先分析「事略」各個組成部分的功能與彙整方式，再評價三位主稿秘書為後世塑造蔣中正「公共形象」的努力。

在可運用的材料之中，蔣中正日記是最重要的。秘書節選日記內容反映蔣在「第一時間」對其公開形象的製作與加工。日記之外，另補充摘錄講稿、函電、報告等，以呈現同樣在第一時間，蔣面對士兵、學生、官員時所投射的形象。將公私（至少在掌權時有公私之分）材料並列，秘書們企圖為後世展現領袖人物如何隨著時間推移，建立並詮釋他的公共形象。日記是個測試場，雖然秘書們忽略公眾的反應，卻經常抄錄日記裡蔣中正對公眾反應的看法，因此我們再次得以察覺秘書們所建構出蔣為回應群眾重整「形

象」、對後世合理化其行為的證據（例如王宇高清楚呈現了蔣決定容忍日軍占領濟南，是為了完成北伐，並非由於軟弱或畏懼而離棄市民）（王宇高，1928年5月6日；《蔣》，2003:3/280-85）。

為了拼湊故事，秘書們選錄的材料往往十分坦率，坦率到甚至令人覺得不該公開出版。舉例言之，王宇高寫到蔣中正對汪精衛的印象：「與兆銘語總覺無趣。」（王宇高，1932年3月12日；《蔣》，2004:13/406）。這類摘錄使秘書能靈活運用以型塑蔣的公共形象。

秘書們是如何將日記的片段結合於「事略」中呢？追根究柢，原始的日記段落是什麼樣子？首先，日記本印有固定格式，每頁上方為名言警句欄，其餘尚有「提要」、「氣候」、「溫度」、「地點」等數個欄位。此外，蔣也自創項目，包括「雪恥」、「注意」、「預定」及「反省」，但並無固定次序，也未必每日撰寫（參見1933年1月26、27日〈蔣中正日記〉，盒36，胡佛研究所藏）。

為使摘抄的日記片段合適放入「事略」，秘書們有時會將其改寫或重新措辭，以符合史實。舉例來說，1928年5月濟南慘案發生後不久，蔣於日記闢「雪恥」一欄，首欄寫道：「整頓教育，嚴整組織，用賢任能，是滅倭雪恥之要（王宇高，1931年5月14日；《蔣》，2003:3/350；粗體為作者所加）。這裡王宇高刪去「滅」字而以「抗」字取代。儘管與原著不符，王宇高

忠於實情，另一方面也緩和了傳諸後世的公共形象。

秘書們也將日記內容改為第三人稱。顯然在遵守原意的範圍內，他們可以自由編寫蔣的文字。舉例來說，我們可將1936年12月西安事變時宋子文訪蔣的相關日記原文與「事略稿本」經由秘書摘抄的段落相對照。原文為：

上午十一時許，余正在睡中，子文忽入門，余目猶迷霧，不辨其為子文也。少頃清醒，始識其真為子文。

「事略」摘抄為：

公仍在高宅。今晨，公睡最酣。上午十一時，宋子文推門入見。公於朦朧中幾不辨為誰，移時清醒，乃知為子文。

在後段中王宇高至少改寫了三處：其一，將日記原文場景化，指出蔣人在高桂滋公館。其二，也許由於蔣上午十一時仍在寢（他通常黎明即起）而睡眠惺忪，王推論蔣熟睡好眠。其三，王將觀點由主觀改為客觀。蔣的主觀印象是宋出現於迷霧中，王則客觀描述蔣雙眼朦朧。

一方面，王宇高的改寫影響了「事略」中蔣的發聲。後人從此必需仰賴秘書的推論及詮釋。蔣確實熟睡嗎？也許他一夜未能成眠，因而雙眼模糊。蔣以為宋出現在濃霧裡

的主觀感受也被刪去了。

另一方面，王宇高和其他秘書明白，「事略」不僅止於日記的抄錄。將日記片段場景化有助於全面呈現蔣的政治領導風格，此外，第三人稱敘述使「事略」整體文風一致（劉維開，2003年）。雖然秘書們改寫蔣的文字可能因而忽略或誤解原意，但卻補充了場景與細節。

秘書所選錄的片段顯示了蔣中正日記篇幅既長且有條理，其中包括了每日起床時間、正在閱讀的書籍、身體狀況、經過之處與交通方式等等。這些日積月累的觀察紀錄，對於理解蔣的習性非常珍貴。也許知道他每日早起閱讀一事無關宏旨，但了解他一次一本、有系統而徹底地看書，則能提供洞悉蔣領導風格的線索。

這些抄錄的片段也反映了蔣對新儒家自我修養的強調。例如1928年6月15日當天，蔣發了兩次脾氣。自我檢討「余好勃然憤怒，甚至失態」（王宇高，1928年6月15日項；《蔣》，2003:3/520），蔣在日記中寫道：

不發怒，不罵人，亦不灰心。〔我必須〕養其〔怒氣〕未發之中，以求既發之和。庶幾其可乎。

往後的摘錄也一再顯示蔣努力抑制脾氣（例如王宇高、王宇正，1928年6月19、20日）。透過類似節抄，秘書們嘗試將蔣描繪為一個

力守新儒家傳統而品行端正的領導人。

最重要的是，秘書們透過抄錄並將文字片段場景化，表現蔣對扭轉歷史進程的努力。蔣的雪恥欄如何反映他與軍閥馮玉祥1928年的對談？他如何回應1931年黨內的嚴重分裂？對於日軍進犯瀋陽，他的替代計畫是什麼？如此這般的付出，在在突顯了蔣在真實生活中為樹立自我公共形象的嘗試。

如果日記摘錄主要地確立了後人對蔣領導風格的理解，那麼函電、報告及講詞則使人更進一步了解他與軍隊領導同僚、下屬、士兵及群眾的互動。檢視這些次要的組成部分可以發現，秘書們通常每日收錄電文。電文經常是蔣的直接命令或要求（例如軍隊移師）或對他人電報的回覆。由於電文文句明確，秘書毫無改寫的空間，有時則提供背景資訊，再全文抄錄。

秘書很少收入報告。以〈敵乎？友乎？〉一文為例，原刊於《外交評論》雜誌，並收錄於一本新生活運動的小冊子。與日記、電文、講詞不同，蔣並未親自撰寫這些文稿。關於蔣對1934年〈敵乎？友乎？〉一文的貢獻程度，有以下兩種看法。根據秦孝儀（1978:784〔譯註：應為786〕），蔣是主要作者：「公所著〈敵乎？友乎？〉一文，發表於《外交評論》雜誌，蓋以日本增兵華北…乃口述〈敵乎？友乎？〉一文，由陳布雷筆錄，而以徐道鄰名義發表於《外交評論》雜誌。」另一方面，張希賢（1995:2）則指出，許多人誤認該文出自陳布雷之手：

「其實不然，此文初稿是蔣中正授意徐道鄰以學者身分表明抗戰決心…不過經陳布雷修改而已。」兩種說法不僅分歧，且都未能說明蔣參與的程度。秦指蔣從頭至尾口述全文的說法令人難以相信，而張也未能釐清實情。蔣若確實「口述」，即非只是個合著者。

雖然蔣親自執筆的程度令人存疑，「事略」仍收錄如上例的重要報告。有時連蔣並未參與的報告也被收錄，原因是有助於交代在回顧時看來是重大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如萬寶山案及朝鮮排華慘案調查報告，此即日本於1931年為策劃九一八事變並最終占領東北的前哨戰（〔譯註：報告作者為汪榮寶〕王宇高，1931年8月6日；《蔣》，2004:11/491-514）。儘管秘書們經常全文收錄此類報告，後續改稿時仍可能將報告加以精簡摘述，以便更準確地呈現蔣的領導風格。

關於「事略」的最後一個組成部分講詞，秘書傾向於選錄即席的、較具蔣個人觀點的演講，包括道德訓話，或稱「教訓」或「訓練」，以及精神講話。雖然蔣缺乏公眾演講的魅力，聽眾反應他的演講冗長乏味、浙江口音濃重而難以理解，然而其講詞內容卻出人意料之直率。

一回演講，蔣指出進場時正門口的痰和鼻涕令人憎惡。蔣斥責聽眾道：「如果外國人比方美國或意大利顧問他們看見，一定覺得這件事就可以表現我們民族的野蠻。」（袁惠常，1934年2月2日；《蔣》，

2005:24/241）。在另一場演講上，蔣提及曾聽到葬禮上西方軍樂與中國古樂並奏、參加者身著麻衣卻乘坐現代汽車，因而悲嘆喪葬儀式常見「亂」象（袁惠常，1934年3月26日；《蔣》，2006:25/343）。這類講稿使人發現，蔣經常為正當形式的缺乏而驚訝，不論在儀態、服裝、儀式方面，文字記錄了他的立即反應，未經秘書修改或緩和語氣。

並非所有講詞都如此直接或即席的。此一風格最常見於蔣對軍校學生的講話，也許他對這類聽眾感到最自在。

總之，為後世塑造蔣的公共形象是個集體事業。儘管蔣是主要製作者，他的秘書們也舉足輕重。考量「事略」形如草稿，秘書們的編纂能力、態度及見解，確實存在很大差異。

三人之中，孫詒在塑造蔣一貫的公共形象的工作上並不稱職。他所編纂的稿本（1927、1930及1933年）缺乏條理，也未見條理化的嘗試，一冊的頁數經常僅是王或袁的一半。孫詒排除了諸如蔣的起床時間或閱讀何書等細節，有時甚且不收入或節抄講詞。然而，有時孫也對某場演講有所領會，因而將其全文收錄。為了收錄某篇講稿，孫偶一為之地將該冊頁數擴充到250頁，超過他冊平均頁數的一倍（孫詒，1933年10月2日；《蔣》，2005:23/6-253）。補充在頁邊空白處的不是一兩行文字，而經常是數百個密密麻麻的小字（孫詒，1930年2月8日；

《蔣》，2003:7/454）。秦孝儀以紙片（日期註明為1958年8月）在孫詒所編1927年的「事略」上註明：「內校定七十一處，有重要關鍵者六處」。筆者在閱讀孫詒的抄稿時，彷彿可見一個不斷看錶的人，隨時預備準時下班開溜。

相較之下，袁惠常的作品使人覺得他是個謹慎而忠誠的部屬。他的書法精美，本人或後人都極少能再加修改。一旦有筆誤，袁習慣將該行出錯處剪下，貼上正確的（如1934年2月5日，印行本則無法識別）。不過，袁的「事略」內容卻有些枯燥，總是選取有利於蔣的文稿。他所塑造的公眾形象雖然一致，但欠缺令人信服的故事。

最後，王宇高這個受過訓練的中醫，寫著一手該行業典型難辨的字跡。與袁不同，王的作品跳脫「忠誠」的框架。筆者認為他嘗試連貫分散的材料，對於美化蔣的後世形象一事不大在意。結果他的「事略」既寫實又具說服力。

編纂「事略」需要洞察力。孫詒很明顯地是三人中最無能的。相較之下，袁、王稱職且各擅勝場。這些在塑造蔣的公共形象上的差異，突顯了秘書們有自由處置的空間，並呈現彼此在能力與動機上的顯著差別。

可信度

雖然袁、王二位秘書勝任「事略」的編纂工作，其作品的可信度仍然啟人疑竇。

畢竟接觸蔣中正的相關史料，總令人有些戒心。蔣中正透過秘密組織如勵行社的協助穩固政權，忠心耿耿的秘書所編纂的「事略」，也不免被懷疑為其神話製造大業。「事略」的至少兩個主要來源，特別讓人加深懷疑，其一為政治的，其二為歷史的。

有關政治的來源，一般以為，蔣中正與國民黨的相關史料流於「表面」，指的是史料僅作外在描述而缺乏實質內容。相反地，這又暗示了表面之下才見「實際」，內含可信之證據。「表面」有混淆視聽的意圖：蔣事實上另有絃外之音，或藉此掩飾陰謀。

這兩層意思都使「事略」的可信度遭到懷疑，也使我們將注意力轉而超越對史料本身的評價。關於第二層意思，表面與真實可說密不可分，不是將表面如面具般揭開就能神奇地顯露真實。有關真實的主張僅是假設，是透過對表面仔細研究所建立或多或少可靠的推測。此外，所謂「實際」事實上可能不過是另一層表象。講稿或寫作所呈現的，畢竟是個人依其觀點對事件的不完美再現。

因此，為了評估「事略」的可信度，「表面」可視為是張可重複塑造的柔軟表皮，用以捏造出一張最具說服力的臉。如上所述，稿本各部分完成度不同，以致於蔣的「表面」在1927年至1934年的部分屬於草創階段，1934年以後的部分則完成度較高。也因為早期的擬稿是分層進行的，讓我們看見主稿秘書預期讀者對其可信度的質疑下，如

何不斷地重塑蔣的「表面」。

在塑造蔣中正的「表面」工作上，兩種時間因素（temporalities）發揮作用：一是秘書編排抄錄的資料呈現了蔣在第一時間裡如何塑造與重塑他的權威基礎。以1930年蔣對抗南北軍閥的中原大戰為例，與1928年北伐完成後相較，蔣已經能更實質地鞏固其權威。中原大戰之前，蔣在講演中一再地、幾乎是過度地提到孫中山與三民主義（袁惠常，1929年4月28日、6月27日、7月6日、9日；《蔣》，2003:5/421-34; 6/79-95, 148-73, 186-220）。彷彿他想藉著與孫中山的一貫聯繫來加強他對外形象的可信度。此役之後，蔣減少談孫，並改而引用保守派理論家戴季陶對孫中山學說的重新詮釋（王宇高，1931年1月19日；《蔣》，2004:9/461-77）。這一連串的節錄反映了蔣在塑造可信的「表面」工作上，日漸減少對孫中山聲望的依賴。

秘書們與蔣合作塑造後世可信的「表面」工作，另一種時間因素則與秘書相關。在開始編纂「事略」之時，孫中山在國民黨的地位已經不容置疑。秘書一貫在孫的名字前低二格，以彰顯他的地位。另一方面，蔣的地位還有待建立。以孫詒主稿的1927年「事略」為例，在每個汪（精衛）蔣並列的場合都被註記顛倒次序的記號，表示蔣的名字已經比汪的重要（1927年9月5日；《蔣》，2003:2/10, 14）。另一個例子是，編纂1929年「事略」時，袁惠常稱呼蔣中

正為「先生」。其後，袁有計畫地刪除「先生」，改為更加恭敬的稱謂「公」（1月1、2日項；《蔣》，2003:5/4, 15）。編纂1934年「事略」時，袁稱蔣為「公」，並前低一格。

雖然秘書們有餘地去提升蔣的「表面」，但也有其限制。假如袁惠常在蔣的名字上空二格，便可能招致猜疑，特別是對國民黨員來說，此舉將蔣與總理並列，是對孫中山的不敬和傲慢。

與評估塑造蔣中正「表面」政治大業的可信度相對，「事略」的歷史可信度則另有衡量條件。秘書雖然以美化蔣為目標，但也必須遵守史書寫作標準。如前節所談到的，秘書首先需要挑選重要（亦即與重大歷史事件相關者）或必要（以蔣的個人資料為例，包括子嗣的出生日期、與宋美齡結婚等，對歷史並無重大影響但於大事記中不論則顯怪異者）（劉維開，2003）。

資料的重要或必要性自然待議。舉例言之，秦孝儀曾推翻王宇高的判斷。考慮1938年與日軍徐州會戰時人數更眾，秦以精緻的書法加註，建議1928年4月16日項有關六或七千名敵對軍閥逼進徐州的文字應當於下次抄錄時刪除（秦的注釋並未出現於印行本）（王宇高，1928年4月16日；《蔣》，2003:3/133）。另一個例子是，劉維開（2003年）認為許多有關蔣回憶夫妻間對談的摘錄是沒有必要的，理由是這些對談與歷史事件並無直接關聯。我們還能說，

這些對談與生卒日期、婚姻狀況等不同，難以查證。

若是遵守重要與必要的原則能提升史書的可信度，那麼加上個人對領袖的意見或詮釋則有相反效果。如十八世紀史家章學誠所言：

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於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體述而不造，史文而出於己，是為言之無徵，無徵且不信於後也。（Wu, 1990:6
〔譯註：原文出自章學誠，《章氏遺書》卷十四，頁23b〕）

秘書們強調蔣每日生活中可查證的細節，從不抒發己見，如此他人則可對證據的可信度作出評價。例如對日記的摘抄可與日記原文查對，「事略」所摘引蔣的電文稿可與受電人所收電文相查對。對於與特定人物的會談紀要，當事人則可證明其真偽。最後，蔣的所在位置與交通方式也能就侍從室以外的資訊來源查證。

真實性還有最後一道標準。中國史學的基本規範是「任何歪曲事實的修飾必遭受譴責」（Twitchett, 1962: 30）。因此，扭曲或未加以證實的細節將折損資料的可信度。這道最後標準不可避免地與塑造公共形象的政治運作相衝突。如何處理可能有損形象的細節呢？「為保持一貫」，Twitchett 指出：

當事件不符於其他史籍如編年史或他人傳記所呈現的概貌，史家經常訴諸記錄史實的策略，以便保留各自全貌，並同時維護史家作為史實記錄者的專業誠信（Twitchett, 30）。

這正是「事略」可信度的致命弱點：秘書們有目的地刪除了對蔣不利的細節。事實上，「事略」中沒有蔣任何過度不當、違法或殘酷的舉動。因此，可信度的問題基本上來自於被刪除的資訊。

然而三項因素減輕了目的性刪節的問題。首先，「事略」關乎一個持續塑造中的公共形象，編撰者對於要刪除哪些資料並不能做最後決定。其次，即使某位秘書部分或完全地刪除不利於蔣的某些言論，讀者仍然能看到這些被刪除的文句。舉例來說，蔣在一次演講中曾經評論道：「總理之學問，以西洋科學與中國文化為基礎，而余對中國文化反重於科學。」（袁惠常，1929年1月20日；《蔣》，2003:5/75；粗體為作者所加）。袁惠常主稿的「事略」在斜體句上劃了道細黑線。值得注意的是，秦孝儀的《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則完全省略了這句話。再者（此因素與官方版傳記一體適用），「事略」之外還能另覓證據，相關的傳記與其他資訊都可加以補充。

王宇高較袁惠常更為可信。王清楚地貫徹選錄資料的二個標準，亦即與重大歷史事件相關或有助了解蔣的領導作風者，並靈

敏地將這二種資料並列，以呈現其中關聯。1928年5月與日軍於濟南發生衝突後，蔣立誓每日必記如何向日本人雪恥方法一條。王宇高持續抄錄雪恥文中觸及報復日軍的實際策略或反映蔣的領導風格內容，主題包括蔣如何克制脾氣、對日軍進攻的焦慮、接納軍閥馮玉祥建言等。一如史家避免抒發己見，王宇高不過問克制脾氣一事是否真屬於「雪恥欄」，也許蔣的頻繁抱怨或挫折感受可能對領導形象有害，王也不予刪除。

然而王宇高並不會連著數月抄錄雪恥條，如果他認為內容空洞的話。1931年上半年，與日本入侵相較，蔣明顯地更關注於國內的分崩離析，雪恥欄便簡略為四字短語如：

人定勝天。
立志養氣。
立品修行。(王宇高，1931年7月29日；
《蔣》，2004:11/454)

王宇高僅抄錄一次並告知讀者這半年的雪恥欄內容相同，讓讀者省去重複閱讀的工夫。

儘管袁惠常主稿的「事略」精細工整，內容有時卻流於庸贅。例如1934年起，蔣開始在雪恥欄裡摘錄聖經。袁並不告知讀者這一動向，卻固定不變地抄錄所有聖經引文，儘管與每日重要活動極少關聯。袁在選擇講詞上也缺乏一套摘選方法（除了美化蔣

以外），未能讓讀者理解對蔣長期思想發展關鍵性的主題。最後，袁對於自認有爭議性的材料特別謹慎，舉例來說，他刪除蔣中正與孫中山的不同意見，如上述蔣爭論文化重於科學的看法。結果袁所塑造的蔣的公共形象不僅較可疑，並因此缺乏說服力。

結論

跟隨朝廷史官與史家的腳步，蔣中正的秘書們以與正史相仿的文體編纂史料，目標除了堅守專業誠信，更重於樹立蔣政權的政治影響力。然而，其成果與正史並不相同，它反映了民族國家形成的新政治秩序已重新定義國家、領導人與中國人民的相互關係。

在此背景下，秘書們製作蔣的故事時，在需要顧及一般國民感受之處，便會採取新形態的溝通方式，摘錄日記及蔣對不同群眾的言論。此類變遷反映了大眾政治的動力，這是過去帝王時代所缺乏的。

秘書本身也反映了此一變動的情境。張令澳（1995:17）指出，許多侍從室秘書留學海外，不諳古文書寫。與毛思誠早年完成的《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1965年出版）相較，「事略」的書寫相當口語化。

如果1940年代「事略」的編纂反映了世界政治環境的重要變遷，1980至1990年代臺灣的民主化則給予大眾史無前例的機會觀察為後世塑造公共形象的幕後過程。這

些稿本呈現了秘書們在為蔣塑造影響力上的付出有所不同。此外，編纂史料也需要高度技巧。尤其是秘書除了要對蔣及對外在世界皆能充分了解，更要創造一個連貫的故事，他們得從三小時的講稿中挑選兩分鐘的片段、從長篇電文中挑選三行、或從日記裡挑選某個段落，好能清楚呈現出蔣與同僚、部屬、家人及民眾的互動，以便回應或型塑歷史事件。與此同時，他們必須在「客觀」描述真實的史書標準與美化蔣的政治意圖間加以權衡。

諸多問題仍然存在。秘書們（除了孫詒）必然知道未來對蔣領導政權的分析將仰仗一本以「事略」為基礎所編修、最終的官方版編年傳記，好比秦孝儀的大事長編（1978年）。畢竟建立蔣的歷史地位有賴對其政治和歷史背景、政策及他人互動等等的回顧性分析。因而秘書們建立蔣的公共形象的目的，在於型塑後人對其歷史地位的詮釋。

蔣對二十世紀中國的影響仍有爭議，有時尚且受當權者需要的重新評價而左右。究竟蔣是一個反動的獨裁主義者，或是個對於建立現代國家體制舉足輕重、胸懷遠見的進步人士（Fenby, 2003:501）？「事略稿本」既已公諸於世，是否對此辯論結果有決定作用？答案還得視主稿「事略」的秘書而定。例如，孫詒貢獻有限；袁惠常賦予忠貞分子的觀點，下筆充滿防備。反之，王宇高以世故而寫實的手法編纂稿本，相關辯論可能因

此被重新定義。王宇高尤其能技巧性地抽離對蔣的好壞二分法，並仔細檢視領袖與歷史情境的複雜互動。

儘管蔣的歷史評價至今仍持續存在矛盾（Spence, 2004），秘書們的作品與蔣個人的大量寫作與言論，確保這段歷史將繼續為人所關注。「事略」所呈現的形象塑造工作不僅有助於了解國民黨執政時期蔣的權力鞏固條件，也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後人對其政治遺緒的詮釋。

後記

本文改編並擴充自作者2005年芝加哥大學博士論文“Chiang Kai-shek's Uses of Shame: An Interpretive Study of Agency in Chinese Leadership”的一章。

獎助

本文於研究及寫作期間曾接受美國教育部（傅爾布萊特——海斯博士論文海外研究獎學金）、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院及東亞研究中心、聖羅倫斯大學等補助。

【引用書目】

- 〈古今名人〉（日期不詳），收錄於「奉化市農業信息網」：www.fhagri.com.cn/XUXIA/character/wyg.htm（2010/5/11點閱）。
- 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香港：龍門書店，1965年。
- 王正華等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臺北：國史館，2003-2009年，39冊。
- 王宇高，「事略稿本」（1928, 1931, 1932年），《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 王宇高、王宇正，「省克記」（1928年），《蔣中

- 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 居亦僑，《跟隨蔣介石二十年》。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 孫詒，「事略稿本」（1927, 1930, 1933年），《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78年。
- 袁惠常，「事略稿本」（1929, 1934年），《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 張令澳，《我在蔣介石侍從室的日子》。臺北：周知文化，1995年。
- 張希賢，《蔣介石和他的六個秘書》。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 張炎憲，〈序言〉，《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臺北：國史館，2003年，頁 i-ix。
- 陳布雷，《陳布雷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
- 曾品滄，〈蔣中正總統檔案〉，收錄於國史館審編處編，《國史館現藏史料概述》。臺北：國史館，頁 174-179。
- 漢語大詞典編纂處編，《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3年。
- 劉維開，作者於2003年1月於新店國史館的訪談紀錄。
- 蔣中正，〈蔣中正日記〉（1917-1923、1925-1972年）。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 Fenby, Jonathan, *Chiang Kai-shek: China's Generalissim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New York: Carroll and Graf, 2003.
- Franke, Wolfgang, "The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in W. G. Beasley and E. G. Pulleyblank (eds.),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1965, pp. 60-77.
- Gardner, Charles S.,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1970.
- Mitter, Rana, *A Bitter Revolution: China's Struggle with the Modern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2004.
- Nguyen, Lisa H., *An Inventory of the Chiang Kai-shek Diaries 1917-1972*.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2009. www.hoover.org/hila/collections/19400629.html (accessed May 12, 2010).
- So, Wai Chor, "The making of the Guomindang's Japan policy, 1932-1937: the roles of Chiang Kai-shek and Wang Jingwei," *Modern China* 28: 2 (April 2000), pp. 213-52.
- Spence, Jonathan, "Before the east was red," *New York Times*, Feb. 29, 2004, sec. 7, p. 9.
- Taylor, Jeremy E., "The production of the Chiang Kai-shek personality cult, 1929-1975," *China Quarterly* 185: 1 (March 2006), pp. 96-110.
- Twichett, Denis, (1962) "Problems of Chinese biography." in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 Press, 1962, pp. 24-39.
- Vogelslang, Kai, "Some notions of historical judgment in China and the West" in Helwig Schmidt-Glintzer, Achim Mittag, and Jorn Rusen (eds.), *Historical Truth, 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Ideolog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Culture from a New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2005, pp. 143-75.
- Wu, Pei-yi (吳百益), *The Confucian's Progres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in Traditional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1990.
- Yang, Lien-sheng (楊聯陞), "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Standard Histories from the T'ang through the Ming dynasty" in W. G. Beasley and E. G. Pulleyblank (eds.),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1965, pp. 44-59.